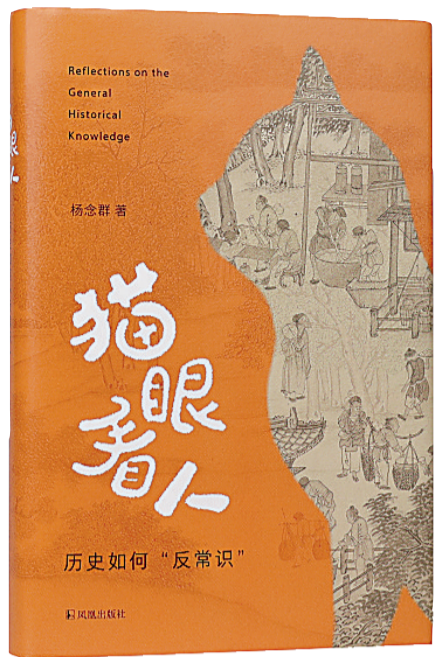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反常识”的历史观，激活鲜灵的思想

——读杨念群《猫眼看人：历史如何“反常识”》

□黄悦



《猫眼看人：历史如何“反常识”》，杨念群著，凤凰出版社，2024年10月

《猫眼看人：历史如何“反常识”》一书由一对父子关于养猫养狗的对话展开，儿子想养猫，可是父亲的反应相当决断和不容商量：“猫是奸臣，是最无情无义的东西，狗才是忠臣。”人们对猫狗的不同选择，其背后有一定的价值衡量标准，父亲以一种貌似理所当然的共识给儿子造成一种压迫，而孩子只能选择沉默。在父亲的眼里猫狗是这样的，那么在猫狗的眼里人又是什么样子的？作者为什么更欣赏猫眼看人？猫眼看人又人眼看历史有什么联系？其中蕴含着作者怎样的历史观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开始了阅读。

该书是杨念群教授在对当代历史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所作的关于“览史”“阅世”的一系列思考。作者从历史常识出发，延宕开去，深思议论藏匿于史书中不为人所知的种种面向。全书围绕“反常识”的历史观，用66篇凝练的文章

铺展开来，多以提问的方式引出对某一现象的讨论。无论是写皇帝还是乡绅，写记忆还是写人性，写科举制还是写国学热等，作者都试图打破“常识”的束缚，去探寻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更多的意蕴。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：“收到这个小册子里的文字杂七杂八，无法归类，大致不出读史阅世的零思碎想。”“历史如何‘反常识’”作为本书的副标题，也是作者致力探讨的问题。

常识作为一种普通知识，是支撑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，也是历史积累的结果。而该书之所以提出“反常识”，是因为一些本身应当被怀疑的历史常识，却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。“反常识”不是说事事要拧着干，将一切“常识”推翻，而是尝试在各类“常识”的叙事笼罩之下，寻找其他更为合理的历史观作为补充。“反常识”的历史观的提出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，也不是要和现代化史观、后现代化史观等其他历史观唱对台戏，而是作者对历史叙事的一种探索。作者认为任何有益的观点都应该并行不悖，不存在最终权威，所以尝试对历史进行更多的探索，使人们既可以看到历史这棵大树的枝干，又能看到枝干上层层叠叠的树叶；既能感知到历史的大轮廓，也能看到人的喜怒哀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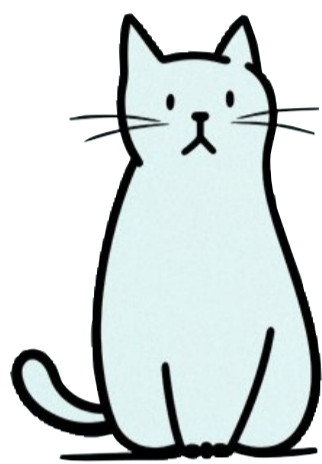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以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探讨为例，来看何为“反常识”的历史观。提到科举制度，我们可能会想到刻板、陈腐的八股文，会想到摇头晃脑读四书五经的老童生，会想到那个“发疯”的范进……然而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，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到了晚清时期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，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说他毫无用处。该书用大量篇幅探讨科举制度，在作者看来，科举制不是简单的考试制度，它具备多种功能，蕴含着相对公平的人才分配设计，一直以来被人们所诟病的其实更多是八股取士，即科举考试的内容。《科举考试果真一无是处吗？》一文详细介绍了科举的考试规则、内容以及被骂的原因，既批评了科举考试中第一、二场考试要求考生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的僵硬模式、八股文写作对自由心灵的束缚，同时也客观地肯定了科举的3场考试兼顾道德人文与经世致用的均衡。《“呆子治国论”错在哪儿？》一文，则认为科举选拔出来的人并非全是“呆子”，其中不乏能臣循吏，科举作为一种人才选

拔手段，给有能力的人提供一种入仕的途径，而他们上任后通过摸爬滚打的历练，也能治理好如乾隆时期3亿人口的帝国。还有其他文章也谈到，科举不仅具备人才选拔和分配的功能，那些虽未能由科举而得以入仕的下层举人和秀才形成的士绅阶层，他们在承担着修桥铺路、济贫扶困和道德教化等职责的同时，还可以传达民意，因此科举制还具有某种“代议”的职能。在此，作者并不是要美化科举制，而是在承认其对社会发展存在阻碍的前提下，仍去探索其积极的一面。

历史没有标准答案，我们知的历史也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，历史的阐释是可以多维度的。无论是现代化史观、后现代化史观，抑或是“反常识”的历史观，都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路，帮助我们去看历史、理解历史。“任何理论只具有对个别经验的凝聚和提炼作用，它可以防止经验被滥用而流于琐碎，却无法普遍适用”，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“反常识”也会变成一种僵化的“常识”，我们也会探索出更多的道路。历史“既不是进化论，也不是循环论，而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理论”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不是一条直线，要警惕认识过程中的各种陷阱，克服僵化刻板的认识，去构筑自己的历史观，去激活一些鲜灵的思想，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。

《猫眼看人：历史如何“反常识”》一书以风趣幽默的笔触讲述种种历史现象，探其背后的枝叶叶，并试图打破“常识”的束缚，去探索历史和现实的多面向。阅读本书，我们不一定认同作者的所有解读，但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“反常识”呢？

（作者系凤凰出版社江苏文庫编辑部编辑）



墓志里的士族风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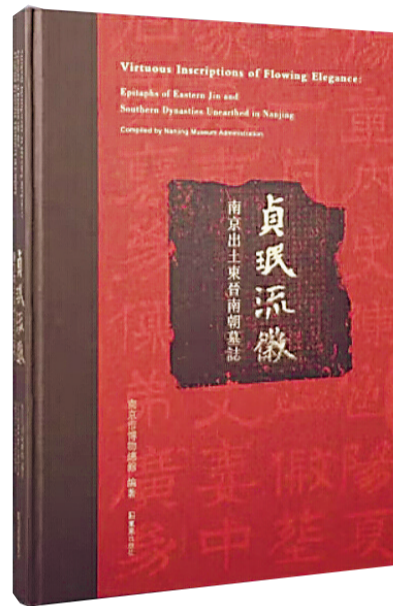
□李霏

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的都城，今江苏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出土了大量的六朝文物。其中，东晋南朝时期的墓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研究意义。墓志以记载逝者的姓名、乡贯、家世、婚聘、生卒、行实等客观信息以及对逝者功德德行的颂扬为主要内容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出土东晋南朝墓志七八十种，大多数于“六朝古都”南京出土。

《贞珉流徽：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》（以下简称《贞珉流徽》）一书汇集了南京地区出土的53件东晋南朝时期的墓志、墓砖铭文，其余因体例及其他原因，未能收录整理的东晋南朝墓志，仍作为书中“绪言”的附图加以使用。因此，可以说《贞珉流徽》一书几乎囊括了目前已发现的所有东晋南朝时期的墓志资料。此次对于东晋南朝墓志的全面整理，是对史籍文献中历史信息的重要补充，并为研究六朝文学、文字与书法艺术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依据，展现了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深厚底蕴。

全书体例编排独树一帜，分为绪言、图版、释读、专论四部分。“绪言”部分对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：首先，梳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“志墓”习俗，最早可追溯至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铭旌，即葬仪中立在灵柩前表明逝者身份、籍贯并于下葬时盖在棺木上的旗帜；秦汉时期的刑徒死，也通常镌刻着死去刑徒的姓名、乡贯与亡故时间等内容，并置于尸骸之上；汉墓随葬的木质或陶质的告地册，记载内容更为详尽；东汉以来墓室内镌刻的题榜与出自模印的砖铭也属于“志墓”的遗存；到了魏晋时期，墓志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。其次，概括了墓志的重要价值，即所谓“墓志之成，始于书写”，墓志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所镌刻的文字之上，一方面墓志所记载的内容，往往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，客观上为补正史籍文献提供了重要依据；另一方面，墓志文字的造型艺术体现着汉字艺术的演变，而历代重要人物的墓志多出自家手笔，因而有极高的文学、艺术价值。再次，分三个阶段梳理东晋南朝墓志的著录：即宋代以前、宋代至民国时期、20世纪50年代至今。其中，宋代以前主要是对文学资料的整理，如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《昭明文选》与唐代欧阳询等编纂的《艺文类聚》就辑录了不少南朝墓志的志文。到了宋代，金石学兴起，此后地下出土的文物成为墓志著录与研究的支点。20世纪50年代至今，对东晋南朝墓志的著录则集中于考古发掘报告或墓志释读、考证等相关文献。最后，以墓志材质与形制、墓志体现的葬俗、志文体例和内容、墓志的史料价值和墓志的书法等为主题，分别论述，展现了东晋南朝墓志学术研究在内容上的蔚为大观。

《贞珉流徽——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》，南京市博物馆编著，凤凰出版社，2024年7月



案头增新著，肘后检青囊

——评沈澍农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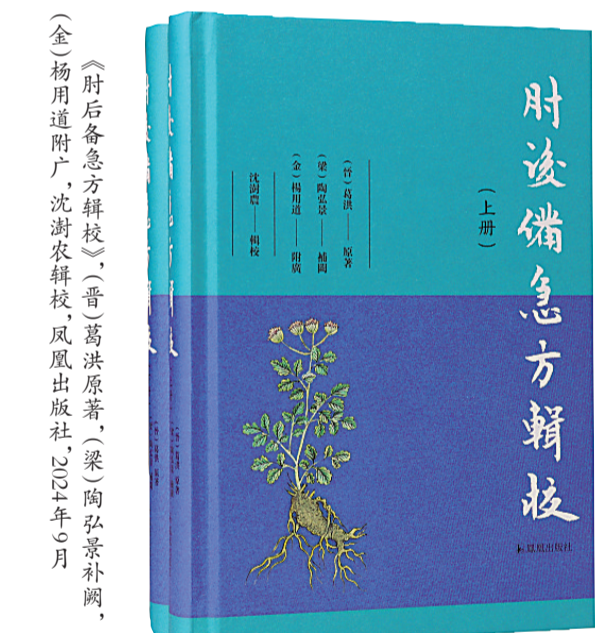
□于业礼

沈澍农先生新近著作的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一书，展卷阅读，颇多感佩。《肘后备急方》是一部医方书，是葛洪在所著《玉函方》一百卷的基础上，“采其要约”而成，所载以简、便、廉、验的验方为主。范行准先生在《中国医学史略》中说：“就现在的《肘后备急方》而言，其中有不少极有价值的经验记载。”事实诚然如此，如青蒿素的发现，就源于《肘后备急方》所载用“青蒿一握”治疗疟疾的医方。

在探讨中国医学的起源时，有不少学者都倾向源于经验之说。因此，他们推断早期用以治疗疾病的医方，必然也多是单味药为主。从近年来不断发掘出土的简帛医学文献中，我们也确实证实这一点。主治功效相似，或配合使用，才逐渐发展出药味较多的复方。通过对出土的清华简医方、北大秦简医方、阜阳汉简《万物》以及马王堆《五十二病方》、老官山《治六十病和剂汤法》等，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医方从单味药到多味药的发展过程。传世医书中，以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为主的仲景医书，可以视为是东汉时期对前代医方的一次总结，流传至今，被称为“医方之祖”。葛洪著《玉函方》一百卷，无疑又是一次重要的总结，很可惜，《玉函方》已佚失不见，如今已不知其面目。仲景医书收载医方以复方为主，单味药组成的医方也有，但不多。可知经过数百年发展，医学理论与治疗手段日趋完善，以单味药组成的单药方与多味药组成的复方开始出现分化。分化的主要原因，可能是复方的疗效和安全性都更好。《玉函方》中所收医方，应也是以复方为主，偶有单药方。复方药味多，制备不易，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单药方无疑更具实用性。葛洪将《玉函方》中的单药方汇集起来而成《肘后备急方》，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。从编撰目的来说，《肘后备急方》和《玉函方》有着明显的不同，但无意间，葛洪其实也完成了一次对单药方的总结。也因此，《肘后备急方》在某种程度上，也形成了与仲景医书的“双峰对峙”，各代表一种医学治疗方法上的取向。

中国医学一以贯之，流传至今，似变化不大，其实并非如此。自秦汉以来，中国医学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演变。如现在习知的《素问》《灵枢经》《难经》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等医学经典著作的确立，都是在唐宋时期完成的。唐代以前，仲景医书并非医学的主流，流传并不广。与之相类，《肘后备急方》也并非一直受到重视。其在著成后，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流行，陶弘景曰：“寻葛氏旧方，至今已二百年，播于海内，因而济者，其效实多。”陶弘景觉得葛洪此书尚有“阙漏未尽”之处，故而为之补充，将原书86篇调整为79篇，复添22篇，为一百一篇，仍作3卷，改书名为“补阙肘后百一方”，是取佛教“四大成身，一大辄有一百一病”之义。自此，《补阙肘后百一方》（以下简称《百一方》）与葛洪所著《肘后备急方》同时流行于世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“肘后方六卷，葛洪撰”和“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九卷”两书，但称后者已亡。唐代时，《肘后备急方》曾有所流行，出现增补校改本。开元年间，唐玄宗曾诏令各州“写《本草》《百一方》《集验方》藏之”，可知当时流行的已是经陶弘景增补过的著作。宋代设校正医书局校勘医书，但未及《肘后方》，亦未见有刊刻该书的记载。《肘后备急方》一书淡出主流医学视野，几乎亡佚。幸赖葛洪、陶弘景两人的道教背景，《肘后备急方》被收入《道藏》中，才能够保存下来。不过已非全本，且掺杂有后世混入的内容，已不可区分。

明代以后传世的《肘后备急方》皆出于《道藏》，内容颇有残缺，故需要辑佚；而也因为唐宋时期的著作如《千金方》《外台秘要方》《证类本草》《医心方》等书中大量引用《肘后备急方》的内容，才有了辑佚的可能。在此之前，有关《肘后



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（晋）葛洪原著，（梁）陶弘景补阙，（金）杨用道附广，沈澍农辑校，凤凰出版社，2024年9月

备急方》的辑佚著作，先有尚志钧先生的《补辑肘后方》，后有胡冬斐先生的《附广肘后方》，珠玉在前。沈澍农先生再次著成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一书，实属不易。别开生面，更是难上加难，不过也因此凸显出沈先生不凡的学术功底。

传世早期医书中，像《肘后备急方》这样仅有残卷传世而需要辑佚者不少，如《小品方》《新修本草》等，而相比之下，《肘后备急方》的辑佚可以说是最难的。

首先，从文本流变程度来说，《肘后备急方》最为复杂。根据上文梳理及沈澍农先生的研究，《肘后备急方》最初为葛洪著作，后经陶弘景调整增补为《百一方》，后又经唐人、金人等续为增补、附广，文本流变程度较大，不同时代的医书所引《肘后方》文本不同，所存佚文便不相同，处理起来就颇为不易。如唐代苏敬所著《千金方》中引用《肘后备急方》不少内容，但《千金方》在宋代经过校正医书局诸臣校改，文本发生变化，存世有宋改本和未经宋改本两个系统，所引《肘后备急方》内容也有所变化，需要甄别取舍。再如各书引《肘后备急方》内容格式也很不一致，有的是直接引，有的是转引自他书，还有如《外台秘要方》在引用他书时，于引文末注曰“肘后同”，或“肘后如何如何”，说明《肘后备急方》中也有相似的内容。对于这些材料，之前辑本多是依据某些标准进行提取或删改，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一书则“忠实地将抄录佚文条在源书中的存在情况，以反映其历史真貌”，做法非常严谨。

其次，《肘后备急方》存世佚文较多，搜辑不难，如何编排却很难得思考。明人自《道藏》中翻刻出的《肘后备急方》，是目前传世的版本，共存8卷73篇，相较于陶弘景调整增补的“百一篇”，已不少有遗漏。又传世本每篇中，除掺入不少后世医书内容，也有阙文。故辑佚《肘后备急方》一书，所得佚文就会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属传世本《肘后备急方》全无篇目的，一类是属传世本《肘后备急方》有篇目而内容有损者。事实上，还有些佚文无法具体知晓所属篇目为何，只能根据具体内容判定大概归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一书在佚文编排时，共分成三种情况：第一种情况是佚文在传世本有篇目的，归入各篇目之下，冠以“辑佚”之名。第二种情况是佚文属传世本缺失篇目者，重新辑出整篇内容，并参考其他书所存增补篇题。第三种情

况是传世本、引载本皆无原篇名，按“佚文主旨、源书归属酌情另立”“新辑佚篇，酌拟新篇题”。将佚文作这样的分类排布，非常清晰，既能最大限度地收载佚文，又能反映出辑佚者对佚文归属篇目的判断等。辑佚内容附于传世本原篇内容之下或另立成篇，也不会打乱传世本内容，造成文本再次割裂的现象。不过佚文所属篇目既是出于辑佚者的判断，部分佚文的归属便仍有讨论的余地，也给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空间。沈先生在《辑佚与校注体例说明》中已有交代，不烦举例。

再者，辑佚医书，不管是清儒还是近人，大多疏于校勘，这也是医书辑佚史上存在的最大问题，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可谓是弥补了这一不足。沈澍农是校勘医书的大家，参与及主持校勘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医心方》等，都是学界通行使用的版本。更是自2014年开始出版《肘后备急方》的校注著作，先后出版过3种不同体式的校注本，尤其以《肘后备急方校注》为代表，是阅读使用《肘后备急方》的通行本。积多年之功，体现在此次出版的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一书中，自然会有许多令人拍案的校勘成果。如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以“辑”为主，但“校”也是重要内容，既包括对传世本的校勘，也包括对新辑佚文的重校等。对传世本的校勘，书前所附《肘后备急方》综考》第五部分，即“校读举例”中，有非常多且漂亮的校勘举例。对于新辑佚文的校勘，其实更为重要，因为不仅涉及《肘后备急方》一书，还涉及源文献的校勘问题。如卷六《治卒卒诸杂物不下方第五十》引《外台秘要方》卷八《诸骨鲠方》云：“用细二两，以火煎蜜，内一段绵，使热灼灼尔，从外缚哽所在处，灼辄以贯绵以上。”以“绵”来“缚”，似乎也能讲得通。但沈先生注意到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十六有同条，不作“缚”而作“薄”，再根据他平时对医药文献用字研究的积累，作注曰：“薄：当作‘缚’，即后世‘敷’。上引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同方作‘薄’，同此。”“缚”在古医书有敷布、敷药之义，在古籍中文字变例颇多，如傅、薄、铺、勃、付、拊等，大约元明之际始作“敷”。作“缚”则颇为罕见。但从以上校语看，此处“缚”并非其常用的缚扎之义，亦应读作“傅（敷）”。此校从语境来看，当无疑义。而这样的校勘，既补了《肘后备急方》的佚文，又因这样的联动校勘，同时解决了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外台秘要方》中的难点。

除以上所说内容外，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一书的主要成就，还应包括对《肘后备急方》一书的研究，即书中作为“代前言”的《肘后备急方》综考》，可以作为此书的前言来看，其实也可视为单独的一部研究著作。在这篇研究中，沈澍农考察了《肘后备急方》第一位作者葛洪的生平概要以及该书的著成与嬗变、主要内容与学术成就、文本现状，并作校读举例，其中很多结论都改变了既往对《肘后备急方》一书的研究成果。如“诸序论考”中关于《鹿鸣山续古序》的考察，从文本细节处出发，推测其附入《肘后备急方》的时间大约是在北宋时期等，令人信服。

沈澍农以积年校勘、研究医书的经验和心得，著成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一书，不管取得如何非凡的成果，都不足惊讶。不过对于我辈后学来说，此书除作为一部传世医书的研究著作，被视为《肘后备急方》的一个传本外，更应看成是医学文献研究的学术典范，常备于案头，时时翻检，以激励自己。刘禹锡曾有两句诗说“案头开缥帙，肘后检青囊。唯有达生理，应无治老方”，是谓翻遍医书，也无治老病的医方，还是善于养生更为重要。撇开后面的内容不管，仅“案头开缥帙，肘后检青囊”两句，化用于沈先生《肘后备急方辑校》一书来说，可谓再合适不过，今挪用于此，与读者共勉。

（作者系上海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）

凤凰出版社

凤凰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